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 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周恩来与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号鼎堂。四川乐山人。著名诗人、戏剧家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艺术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他于 1914 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文艺运动。五四时期，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1926 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后旅居日本。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组织和团结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曾任《救亡日报》社社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日战争胜利后，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及其发动内战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9 年 7 月，被选为首届全国文联主席。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

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文学作品有诗集《女神》、剧本《屈原》等有《郭沫若全集》行世。

1976年1月15日，这是一个令世人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参加这次追悼会的人，很多很多，大家满含热泪，伴着凄婉低回的哀乐，向庄严肃穆的纪念灵堂缓缓前行着……。

这时，一位老人坐在轮椅上由人推着。他目光呆滞，眼泪不住地顺着他那没有血色同时又布满皱纹的脸慢慢地往下淌。到了灵堂前面的时候，轮椅刚刚停住，他就想站起来。推他进来的同志使劲地往起架他，但他却怎么也站不起来。但是，他不甘心，他挣扎着，终于由两个人架着，勉强地使自己的身体离开了轮椅。而后，他又把自己弯着的腰，尽力地挺立起来，接着，又深深地弯了下去！当时，谁都清楚，他，这是在用自己的力所能及给周恩来鞠一个躬！他的动作是那样艰难，他的神情却又是那样专注。

这位老人是谁呢？他就是当年在文化沙场上纵横驰骋的骁将郭沫若。

郭沫若是四川人，周恩来是江苏人，郭沫若是文坛巨匠，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既然如此，为什么周恩来的逝世会使郭沫若那样悲痛？为什么郭沫若也因病正在医院还硬要拖着病体、座着轮椅来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要知个中因由，我们还是从他们开始认识说起吧。

他们在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中就建立了战斗友谊。
郭沫若认为他在周恩来身边是“接触着一个奇迹”。
周恩来说，郭沫若“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
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
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实力……”。

郭沫若和周恩来不仅是老朋友，而且是老战友。

郭沫若首次见到周恩来的时间是 1926 年 4 月 而周恩来见到郭沫若 并同他坐在一起商讨工作 则是在两个月之后。

1926 年初 由林伯渠推荐 郭沫若由上海前往广州 担任了中山大学文学学院院长。

1926 年 4 月 13 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报道 其标题是：

昨日广州举行总理纪念周中

伍朝枢周恩来穆南三先生演讲

这条报道所说的“三先生演讲”是郭沫若刚到广州中山大学不久举行的。当时，他作为一名普通听众，坐在台下听了这次讲演，从而使他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因为周恩来在他们讲完之后就离开了，所以，这次他同周恩来只是见了一面，并未单独接触。但就是从此以后，他们接触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了，而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在 1926 年 6 月 20 日至 23 日由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在广州主持召开的战时政治工作会议上。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不仅作了《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的报告，同时还被推举为宣传训练及补充委员会主席，其副主席就是恽代英和郭沫若。会议期间，郭沫若和周恩来同大家一起

讨论、研究和审查各种问题和议案，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两人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沟通。郭沫若在《纪念邓泽生先生》一文中说，这次会议“有好些计划，大抵是出于恩来之后。因为他是中国政治部工作的开山，他的经验丰富而且头脑致密而迅速，在那时我实在接触着一个奇迹。”事实也的确如此。通过这次会议，郭沫若深深地认识了周恩来的伟大和超人之处，周恩来则不但握了这位浪漫主义诗人的手，而且还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了解。

参加这次会议后不久，即 1926 年 10 月上旬，郭沫若便决定参加北伐军总政治部随军北伐。李一氓、阳翰笙得到这一消息后，马上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也非常高兴，说郭沫若参加北伐在政治上影响将是很大的。

当时，周恩来还是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北伐军中政治工作方面的许多工作也都是由他来负责的。所以，他很快通过李一氓、阳翰笙邀请郭沫若到他的家中——南华银行会晤。

在这次会晤中，周恩来对郭沫若决定参加政治部工作并随军北伐表示了高兴和欢迎，同时，还谈到了他的具体工作问题。

在谈到郭沫若参加北伐，具体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的问题时，郭沫若当即表示，他自己没有政治工作经验，做什么都可以，也不需要担任什么职务，挂一个顾问之类的空名，协助别人工作就可以了。周恩来认为，须慎重考虑，并要进一步商量。

具体怎样落实，周恩来对他说，我们先请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的孙炳文把这件事正式转告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先看一看邓演达和蒋介石的反映如何，再考虑下一步的问题。郭沫若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

对于这次谈话，郭沫若非常满意，也十分高兴，并说，还是周恩来把问题考虑得周到细密。

邓演达得知郭沫若决定参加总政治部的工作，并随军北伐后，

也十分高兴，同时很快到郭沫若家中拜会了他。向他表示了他的由衷高兴和欢迎之意，还说，不管郭沫若担任什么工作，他都会把他当成“军师”一样敬重。他们还就革命的前途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为郭沫若参加总政治部工作的问题，总政治部还专门召开过一次部务会议进行讨论。周恩来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讲了郭沫若参加总政治部随军北伐的重大意义，并讲了郭沫若有很强的工作和组织能力，希望大家尊重他、帮助他。

当时从总政治部来说，宣传科长一职，一直久悬未决。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由共产党人来担任这一职务，蒋介石不放心，而国民党中靠近蒋介石的人中，又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孙炳文同周恩来商量后，又征得了郭沫若的同意，便决定推举郭沫若来担任此职。后来，郭沫若不仅担任了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宣传科长，不久又升任该部的副主任。

1926年7月21日，郭沫若随北伐军从广州出发，经长沙很快打到了武汉。武昌攻克后，他就到南昌，在蒋介石手下工作，一共4个多月。在这段时间内，他耳闻目睹了蒋介石的所作所为，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遂于1927年3月31日在南昌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发出了声讨蒋介石的怒吼。事实果不出郭沫若所料，时隔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在这种严重的白色恐怖中，郭沫若于4月14日秘密化装潜入上海，并于当天晚上在李一氓的家中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是根据党的指示于1926年底奉调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的。到上海之后，他于1927年3月，成功地组织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三次起义。

见到周恩来之后，他详细地向周恩来汇报了蒋介石在赣州、九江、安庆指挥镇压革命群众的情况。同时他还告诉周恩来：“我已和

蒋介石彻底决裂，并将上述情况写成了两篇文章，已公开发表和印发。而后他们又一起讨论了下一步的行动问题。现在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中的第二篇文章《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一文就是以这天晚上，他们会面时所谈的情况整理而成并报呈中共中央的。其中第一句话就说：“郭沫若来，道及九江、安庆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纯由蒋氏直接指挥。”可谓证据确凿，不容蒋氏抵赖。一直到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等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第一枪。

担任这次起义的前委书记是周恩来，郭沫若则不仅是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同时也是这次起义军的政治部主任。可能是出于他对这次起义胜利的喜悦，也可能是因为自己有幸能在起义军撤离南昌前赶到南昌，并随起义军一道踏上进军广东的征程，因此，郭沫若在临川写下了他参加这次行动中，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一首五绝：

夜雨落临川，军书汗马还。

一声传令简，铁军满关山。

8月26日凌晨，起义军击溃国民党军钱大钧部，占领瑞金。在这里，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敌强我弱，部队最后被打散，郭沫若和周恩来失去了联系。这时郭沫若非常想念失散的战友们，特别是周恩来。这在他后来所写的《神泉》一文中说得非常清楚：“朋友们的去向，丝毫也不知道，特别是病中的恩来，是不是脱了险，顺畅地到达了海陆丰？”

他们大体于11月上旬，先后由香港到达上海。到上海后，他们很快取得了联系。大家都是死里逃生，见面后分外高兴。

周恩来到上海不久，随同中共中央机关一起转入地下，郭沫若因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要犯，所以也必须秘密隐蔽起来。但这是

不能长久的，经过和周恩来商量，决定他带全家到苏联去。但就在即将动身的时候 郭沫若患了斑疹伤寒 直到 1928 年 1 月 4 日才脱离危险。这样，苏联就没有去成，而欧洲又去不起，祖国又不能呆 如此 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到日本去 而日本 郭沫若又不愿去，经过周恩来的说服，最后决定先到日本，如有可能再从日本转赴苏联。这个过程，在郭沫若的日记中有一些记载，特别是他和周恩来的来往情况其中曾多次提到。如：

二月九日 星期四

豪兄不来，一时不能动身。恐怕十一号不一定能够走成。仿吾说 明早去会梓年 请他去告诉豪 因为他听啸平说 民治已经搬了家。（豪兄：指周恩来。五四时期，在天津成立和领导觉悟社时，为了便于进行革命活动，其社员一律用化名。于是大家用号码抽签，抽到之后，便依其号数为谐音代其名字。当时，周恩来抽到的号数是“5” 便取“伍豪”为其化名。下同）

二月十日 星期五晴

豪和民治来，同吃中饭。

仿吾亦来，约了初梨等来谈话。

这两天的日记，第一则，说明郭沫若见不到周恩来就不动身。一定要设法见到并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同时一定要他知道他动身的日期他才动身。第二则说明是成仿吾为他进行了联系，所以，第二天周恩来同民治一起来到了郭沫若的家里，就有关问题一起进行了交谈，并同他一起吃了中午饭。上面提到的民治为李一氓。此可见当时出版的《长虹》周刊。

在郭沫若就要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周恩来得知郭沫若的住处已被卫戍司令部探悉，第二天早晨就要去抓他。这样，周恩来很快让李一氓通过郑伯奇将这一重要消息转告了郭沫若。郭老当即同成仿吾、王独清离家躲进了由日本人内山完造代订的日本人开设的八代旅馆。尽管这样，周恩来还是不放心，所以，从郭沫若离家，直至他登上日本邮船离开上海，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暗中一直有人对他进行着安全保护。所以，他说他是“顶着一个三万元的赏格的脑袋到日本去亡命的。”

当他即将离开祖国、离开那些在大革命战火中共同奋斗的战友时，若有所思地说：“我真是个孤孤单单地离开了我很不愿意离开的祖国，祖国并不是不需要我，然而我却不能不离开了。在开船的时候 我望着沉默的祖国 悄悄地流下了眼泪。

这是一个伟大战士对祖国、对人民依依惜别的崇高的革命感情。正如周恩来所说，“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实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 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 准备了新的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别妇抛雏回到祖国，到了武汉后，周恩来要他当第三厅厅长 他说：“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 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 帮助欺骗。”周恩来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 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

郭沫若，我们把他称作我国当代文化艺术界的一面旗帜，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郭沫若从“五四”就站在时代的前列 给现代文学的发展以重大影响。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以崭新

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发展史上一块巍巍的丰碑；修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棠棣之花》和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屈原》等历史剧是继《女神》之后在他创作道路上出现的第二个高峰。这些作品，反映了特定时期人民的思想、感情、意志和愿望，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反响。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不仅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别妇抛雏”归国请缨。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国土大片沦亡，民族生存危在旦夕，正在日本的郭沫若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乘着妻儿熟睡的时候，悄悄离家，踏上了归国的小船。在船上，他心情激动，豪情满怀，写下了《归国杂吟》七首，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诗人自己说：“我在当时的确是把我全部的赤诚倾泻了出来，我是流眼泪把诗吐出来的；虽然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它在我的生命史上的确是一个里程碑。”诗人的归来是准备为自己的祖国赴汤蹈火的，所以才有“欣将残骨埋诸夏”的豪迈誓言。

郭沫若一到上海，就立即投入了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运动。“八一三”以后，上海成了战场。但他并不畏惧，而是更加积极地动员和团结广大的文艺界人士和爱国青年宣传抗日，并领导上海市文化界救国协会，为上海地下党办的一份宣传抗日救亡的《早报》编副刊、撰稿。随后为扩大抗日宣传阵地，他亲自筹办《救亡日报》。在他的主持下，还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动员了许多文学、戏剧、绘

画、音乐工作者参加到前线作宣传鼓动工作。

上海抗战三个月，最后被日军占领。不久又占领南京。从此上海成了孤岛。这样，一些文艺工作者有的北赴延安，有的则转移到大后方。郭沫若也不得不离开上海，途经香港，在广州住了 40 天，于 1938 年 1 月 9 日乘车抵达武汉。

当郭沫若到达武汉的时候，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已先期到达。这样这两位老战友经过“十年”的离别终于又见面了。

周恩来来到武汉不久，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按当时的编制，政治部下设四个厅，第三厅是管宣传的，周恩来劝说郭沫若当这个厅的厅长，不料却遭到了他的拒绝。

郭沫若认为，在国民党控制下，第三厅办不成什么事情。他说：“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还说：“让我处在自由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我相信，我一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原谅我的。”

但是周恩来认为郭沫若担任这个职务是非常合适的，因此，曾给他作了许多工作。他对郭沫若说：“考虑是可以的，不妨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在必要时我们也还须得争取些有利的条件。但我们可不要把宣传工作太看菲薄了。”周恩来甚至这样对他说：“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朋友也来劝他以促成此事。

郭沫若对朋友们的相劝非常感谢，但他又对他们说，你看，国民党方面安排的第一厅的厅长是贺衷寒；第二厅的厅长是康泽；第三厅的副厅长是刘健群，这些人都是复兴社的头目，怎么与他们共事？

此后不久 郭沫若又接到了周恩来手书的一张便条：

沫若同志：

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

廿七，一 卅一

周恩来

郭沫若捧着这小小的字条，似有千斤。眼眶中的泪水转来转去 多少年来 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不能公开 现在 又要他与贺哀寒这帮人为伍 他内心的痛苦 能理解的莫如恩来也 只有真正的知己 才能洞若观火地看清这“感情”的问题 也只有真正的知己，才会毫不含糊地批评他感情用事。他感到欣慰，也感到惭愧。

后又经周恩来的说服，并经国民党方面同意，撤走了刘健群，第三厅副厅长改由范寿康担任 阳翰笙为主任秘书 后郭沫若终于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并于 1938 年 4 月担任了第三厅厅长职务。但是 他又希望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 痛痛快快地工作。周恩来又劝勉他服从党的需要 还是以非党人士身份 忍受住内心的“寂寞”为好。郭沫若听了周恩来的话，仍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来领导第三厅的工作。这样 他们就利用第三厅这个政权组织机构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把国统区的抗日文化宣传工作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

为了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他们很快在武汉组织了一个抗战扩大宣传周 其中有文字宣传、有街头讲演、有美术、有电影，最后组织了武汉三镇的大游行。对这次宣传周中的火炬游行 郭沫若在他的《洪波曲》中曾有过一段生动的描写：

参加火炬游行的，通合武汉三镇，怕有四五十万人。特别

是在武昌的黄鹤楼下，被人众拥挤得水泄不通，轮渡的乘客无法下船，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唱歌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谁能说人民死了呢？谁能说铁血的镇压可以使人民永远窒息呢？

无疑，这对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都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国民党推行的是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因此使侵华日军长驱直入，打了 15 个月就连武汉也被日军占领。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与郭沫若不得不于 1938 年 10 月下旬撤离武汉，后来他们又都到了重庆。

抗日形势发生变化。周恩来希望郭沫若离开重庆暂避一时。郭沫若坚持留下，要同周恩来一起并肩战斗。

他说有周恩来这样“一棵擎天大树”什么也不怕
而且斗争一定会胜利

武汉失陷后，国内抗日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倾向日益明显，汪精卫则公开投敌，当了汉奸，文化界的进步活动越来越受到限制。1939 年，国民党政府又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并于 1939 年底至 1943 年 6 月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而 1941 年的皖南事变，更是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一次大规模屠杀，是国民党顽固派对内反共，对外投降阴谋的一个大暴露。

他们到重庆后时间不长，即 1940 年 9 月政治部实行改组，郭

沫若辞去第三厅厅长的职务。11月1日在中共领导下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担任了主任，继续领导文化界抗日反蒋的宣传工作。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为防备“四一二”大屠杀事件的重演，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许多在重庆、桂林的文化界人士撤退到香港等地，当时，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也征求过郭沫若的意见，希望他也能够暂时避一避。但郭沫若表示，他决心继续留在重庆，一方面协助周恩来领导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采取适当的方式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这时作为周恩来来说的确他的工作不仅更繁重任务也更加艰巨了。所以，从内心来讲，他也希望郭沫若能留下来，与他并肩战斗。但他也知道郭沫若留在重庆是十分危险的。从1941年1月到4月重庆的《全民抗战》桂林的《救亡日报》、《国民公论》等数十种进步报刊在国民党的压迫下先后停刊；郭沫若的一些作品也被列入了《取缔剧本一览表》外出时也发现不断有人在跟踪著名戏剧家洪深一家三口于2月5日服毒自杀。就在这种情况下，郭沫若闻讯后偕同医生赶去抢救幸告脱险。洪深在自杀前留下遗书里面说：“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归去。”反映了不少文化人当时的那种满腔悲愤的心情。周恩来闻讯后，赶紧派人前往慰问，同时给予资助，并把他送到了桂林去休养。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周围更是特务密布，活动频繁，办事处的所有成员都作了惨遭不测的思想和各方面的准备。但在这种情况下，郭沫若却坚决地留下来，使周恩来非常感动。

为了工作的方便，这时，周恩来给郭沫若派了得力助手。同时，为了他的安全，也为了给他腾出更多的时间让他潜心研究和创作，周恩来很少叫郭沫若到曾家岩50号去，更不用说到红岩嘴了。如果有事，即便是在酷热的夏天也要不时地摆渡到郭老的住处，重庆乡下的赖家桥。接着，这里便成了周恩来召集一些座谈会，会见

一些友好人士的活动场所。

整个抗日形势在不断恶化，雾重庆的“雾”越来越浓，在重庆的许多人，忧心忡忡。悲观失望的情绪不断蔓延。根据这种情况，有时是周恩来单独前往，大多数情况下是和郭沫若一起去给他们作工作。

《新民报》的一些同人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后，对抗战前景感到茫然，对蒋介石和汪精卫是否会公开合流，抗战能坚持到几时，十分担心。这时，几个人计议了一下：“是否请周先生（当时党外进步人士对周恩来的称呼）为大家分析一下形势，指明方向前途。”他们说干就干，经过联系，周恩来慨然应允。

一天晚上，周恩来就在郭沫若的陪同下，来到重庆附近的华一村，会见了陈铭德、张恨水、罗承烈等《新民报》编采负责人。周恩来详尽地给他们分析了当时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指出抗战必胜的前景，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周恩来还风趣地对张恨水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前进，也可以从反面前进。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就是起了一定作用吗？”

张恨水当时是《新民报》副刊主编，他的长篇小说《八十一梦》，嘻笑怒骂，冷嘲热讽，以犀利的文笔抨击蒋家王朝的贪污腐化，当时，颇受读者欢迎。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干革命总要冒一点风险的，应该在斗争中锻炼自己，坚定自己，不迷失方向。”周恩来讲完后，他又要郭沫若也讲一讲。他们坚定而乐观的革命态度，透辟入理的深刻分析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深深打动和鼓舞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1945年10月30日，正当人们欢声笑语庆祝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时候，传来了冼星海在莫斯科因病医治无效病逝的消息。大家知道，冼星海是我国著名音乐家，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

《黄河大合唱》等作品可以说到处传唱，在音乐界享有极高声誉。他的不幸逝世，在我国文艺界引起极大震动。特别对当时的进步音乐工作者来说，更是一件极其沉痛的事情。在延安，毛泽东亲自为他题写挽词：“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在重庆，周恩来组织文化界人士，举办各种活动以示哀悼。其中，于次年1月初举办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逝世纪念音乐会可以说达到了高潮。这一天，场内场外挤满了人。直到音乐会即将开始的时候，周恩来才从舞台里面走了进来，他后面跟着就是郭沫若。这并不是他们来晚了，而是因为前面人太多，挤不进来，不得不由工作人员想办法让他们从后台进场。

这次音乐会演唱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赞美新中国》等作品。

音乐会结束后，会议主持者李公朴宣布，根据周恩来的倡议，立即成立“星海合唱团”和“民主合唱团”。周恩来为“星海合唱团”的名誉团长、团长为郭沫若；“民主合唱团”团长为沈钧儒。

几天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时旧政协开幕。这次会议结束后，2月10日，重庆各界在校场口祝贺会议成功。结果遭到了国民党特务和一伙暴徒的捣乱和破坏，有60多人被打伤，现场加以制止，第二天他又和邓颖超到医院去看望，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同时要求严惩凶手。

就这样，周恩来和郭沫若一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酝酿和实施了同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的前所未有的较量，同时取得了胜利。就在这种并肩战斗的过程中，他们建立了更为深厚的战斗情谊、战友情谊。当时，郭沫若曾对到了香港的夏衍说：“我们这里幸亏还有一块小小的‘租界’，头上还有一棵擎天大树。”的确，无论是前期的抗敌协会、第三厅，还是后来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在这些小小的“租界”上，郭沫若正是依傍着周恩来这棵“擎天大

树‘越战越勇。一次他还对他的秘书翁泽永说：“鲁迅曾给瞿秋白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十分欣赏这一句，这也适合表达我和周公的关系，不过还不足以表达我的全部心情。”

是的，周恩来在郭沫若心中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而周恩来也越来越觉得他实在是离不开郭沫若了。

周恩来选择以演剧运动为突破口，以打破“皖南事变”后重庆的沉寂局面。郭沫若发挥所长，写了许多历史剧，在《棠棣之花》演出后，周恩来提请大家注意郭老在剧中特别强调“士为知己者死”，他说：“这正是郭老对党感情之深的表现。”

就在这极其艰难的日子里，郭沫若一面协助周恩来积极作好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工作，一面怀着对国民党顽固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一次次掀起反共高潮的满腔愤怒，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下进行文艺创作。

1941年11月，在国民党当局发动的皖南事变半年多一点时间的时候，他的《棠棣之花》就演出了，并获得极大成功。

这出戏是通过公元前371年我国战国时代，抗秦派和亲秦派斗争中的一个插曲，借古喻今，是对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对共产党实行封锁、离间、孤立政策的一个沉重打击。这使国民党当局大为恼火。国民党文化特务头子潘公展，就曾对文艺界人士破口大骂，说现在有人“借演戏搞不正活动”。周恩来却多次出席观看，并保留了这个戏的全部剧照。

周恩来认为《棠棣之花》不仅在政治上有重要意义，在艺术上

他也非常喜欢 特别是剧中的《风火娥》、《依本枝头露》、《湘累》等寓意深刻的诗词插曲更是特别欣赏。为了进一步扩大它的影响，他不仅重视口头宣传，而且，还积极主张在报刊上进行宣传。他认为 报刊的宣传 不仅能扩大演出的影响 解释剧本的深刻意义 也会为新编历史剧开辟正确的道路。因此，他不仅领导《新华日报》和办事处的有关同志讨论了历史剧问题，也讨论了《棠棣之花》的演出 并决定《新华日报》出专刊宣传这个剧的演出 同时解释其深刻意义。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效果，周恩来还亲笔写了刊头题字“《棠棣之花》剧评”。

这时 郭沫若 50 岁生日时间即将来临，为褒奖这位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进行不屈斗争的英勇战士，并让更多的人投身到这一行列中来，他决定要设法纪念一下。

1941 年 10 月上旬的一天，阳翰笙正在重庆天府街郭沫若的家中商谈工作，周恩来欣然而至。

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看了看郭沫若后 兴致勃勃地说：“郭老，你的创作 25 周年和 50 岁的诞辰 我们要庆祝一下。”

郭沫若自谦地说：“我没有什么重大贡献 不必了吧！”

周恩来说：“为你做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 为你举行创作 25 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听了周恩来的解释后 阳翰笙高兴地问道：“由谁来搞这件事呢？”

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还是由你负责吧！”

大家期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首先是 11 月 16 日这一天的清晨，一打开《新华日报》，“周恩来”3 个字就首先映入了读者的眼帘。原来是周恩来亲自写了以《我要说的话》为题的专文。